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哲学（第三辑）

BIANGZHENFA DE LUOZI

辩证法的逻辑

〔德〕狄芝根 (Josef Dietzgen) 著 柯柏年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 · 哲学（第三辑）

BIANGZHENFA DE LUOZI

辩证法的逻辑

〔德〕狄芝根（Josef Dietzgen）著 柯柏年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辩证法的逻辑/李天纲主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 哲学)

ISBN 978-7-5520-1803-5

I. ①辩… II. ①李… III. ①辩证法—研究 IV. ①B0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2187号

辩证法的逻辑

主 编: 李天纲

编 纂: 赵 炬

责任编辑: 唐云松

特约编辑: 陈宁宁

封面设计: 清 风

策 划: 赵 炬

执 行: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

责任校对: 笑 然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上海三联读者服务合作公司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00毫米 1/16开

印 张: 13.5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1803-5/B.180

定价: 72.00元 (精装)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二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

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三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学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榫，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

时学统，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请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

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武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间，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北大的『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仔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德〕狄芝根（Josef Dietzgen）著 柯柏年 譯

辯證法的邏輯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初版

譯者序言

本書原著者狄芝根（Josef Dietzgen）是一個製革工人出身的哲學家。一八二八年十二月九號生於德國之勃蘭肯堡（Blankenberg），一八八八年四月十七號卒於美國之芝加哥。他底哲學的著作，在今日已成為辯證法的唯物哲學之古典的名著了。在一八八〇年，因經濟的壓迫，他就把他底長子佑仁（Eugen Dietzgen）送往美國去謀生計。他每一個禮拜或兩個禮拜寫一封信給佑仁。在一八八〇年至一八八三年之間，他寫有兩組論邏輯的信給他，一是論哲學的，一是論經濟學的。此書就是集他底論哲學的信而成。

本書原名爲『論邏輯書』（Letters on Logic）副題爲『特別地德謨克拉西的普羅列塔利亞的邏輯』（Especially Democratic Proletarian Logic）因爲

牠底正名不能表達此書底精義而副題則嫌太長故我把牠改為「辯證法的邏輯。」

我是從英譯重譯出來的。所根據的英譯本是 Dietzgen's The Positive Outcome of Philosophy, Revised Translation by T. W. Craik, Centenary Edition, 1928 Charles H. Kerr & Co. 誤譯的地方，希望大家指正。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七號譯畢後自序

x

x

x

x

在十年前所譯的這本書現在還要拿來重新印行，這是因為就使是在今天已有許多關於唯物辯證法的著作出版了，這本書還有牠底價值，這是一本很好的入門書。狄芝根在這裏強調了『對立之統一』指出了我們應從事物之相互聯系上去研究事物，這對於打破形式邏輯之偏見，是很有用的。當然，讀者把這本書當做入門書讀後，是還要再進一步讀其他的名著。不論是馬克思，是恩格斯，是列寧，對於狄芝根都很看重，但指出他的著作有一個缺點，就是用辭不十分精確讀者對於這位工人出身的唯物辯證法的哲學家底著作底這個缺點，不要忘記，但，雖有這

缺點，狄芝根底哲學著作，還是辯證唯物論底重要的名著，例如列寧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有許多地方都徵引了他的話現在再介紹他的著作，還沒有過時吧。

一九三九年九月四號

一
親愛的佑仁！

你現在已達學生進入大學的年齡了。他們在大學，不管所擇取的職業是法律，醫學，或神學，都照列先選讀邏輯。他們謂邏輯是一切學問之基本科學。現在你就可知道他們是把學校與生活看做二種分離的東西。我欲你注意牠們底關聯。我們在學校中也生活着，而我們也從生活學習着。我欲把你底橫渡大西洋之旅行，當爲你底初進生活底高等學校之冒險，而我現在就做你底邏輯教授。

我覺得很勝任這種職務。我雖不很懂拉丁文和希臘文，我依然感得有能力好引導你至邏輯科學底深處，比一個依照最受人稱讚的模型養成和任職之德國教授還要勝在。你會承認這類的事是可能的。因爲一個懂得一點的人，解說他所懂得的一點，也許比

一個腦子裏掛滿着官家的學識（Official Wisdom）底規定的貨物之人還要省力些和有效些。

你很幸而在德國的中學校讀有七年書。既然你底教員在你離國的時候給你一張最優的文憑，我就很可以視你不僅有資格好進入美國的生活底高等學校，但也有資格好來理智地聽我底邏輯的演講了。

但爲欲使我底具有良好的訓練的學生不輕視他底自學的教師，我就指出這點事實：實連一個受過廣博的教育之人，他對於某些專門的學問，也一定還是個門外漢；在別一方面，一個對於好多事情完全不懂之人，他對於某一專門的學問，也可能懂得比以前的科學所理會的還要多。現在我在這裏就說我所具有的關於邏輯的智識，是多於從這一部門的專門文獻所能找到的。我底親愛的佑仁，我具着一切應有的謙卑而說出這話，並不是爲欲誇耀我自己，但是爲欲使我底爲師的職務具有相當的威權並欲鼓起我底學生之信任心。

是的，我重視信任。你雖知道我是一個絲毫不顧威權的民主黨人，但你也將知道我是一個辯證法之畢業生，他可讓浴盆中的水流盡，但還緊握他底兒子，不讓他給水帶流出去。對於兒童以及在兒童時代的國家，不能沒有威權，而對於教員，不管他是教兒童或教國家，則不能沒有適度的鼓勵信任的空氣。學生一定要先相信他底教師底學識，使他注意教師所講的東西並且願意去學。到後來，學生已理解了該種學問，一切的威權就用不着了。這種受人何等頌揚的威權，是受時間底破壞的潮流（*The destructive stream of time*）所支配，受歷史的過程（*historical process*）所支配。

從前的人類，常被預先存有的觀念引誘去崇拜暫時的東西。這種企圖，被利用去保護一般的威權，以及某一王位或某一教壇，使他們不受時間底攻擊。會滅亡的東西與不會滅亡的東西之間的關係，常很爲人所誤解。現在，邏輯既然是一種以糾正理智爲目的之科學，我們就將屢屢涉及一般人對於時間（*Time*）和永恆（*Eternity*）之錯解。

最有名邏輯的學者，被人家責罵他們底體裁太繁難而解說又很不清楚。連語言學者我也聽見他們怨言邏輯之使用難解的外國的名辭這種非難，有許多可歸咎於邏輯底對象物之過於隱秘，幾千年來的邏輯學家都竭力想把牠弄明白，但都沒有成功；有許多可歸咎於邏輯學者之好用學院的術語之惡習。但最大的錯處，還是學生之惰用心。沒有什麼東西是不用心力所能學到的。假如你計及你底將來的發展，你就會認識出基督教對於工作之咒詛（譯者按：聖經謂因亞當違背上帝之命令吃智慧果，上帝就把他逐出樂園，罰他自己勞作。故基督教以為工作是犯罪之責罰。）是不真確的。工作不能生自罪惡，因為牠是一種幸福。你會個人地經驗到當體力的或心力的工作做成功之後感覺到何等昂然自得。

我們若不肯用腦力，那末，從科學所得的只是些通常的瑣碎的東西。

假定你是很願意做着必要的心智的勞動的，我答應你我將盡力使這功課容易。我很情願這樣做，因為，我坦然自認，這些信札，不僅是寫給你，還要把牠們發表於報紙，使較